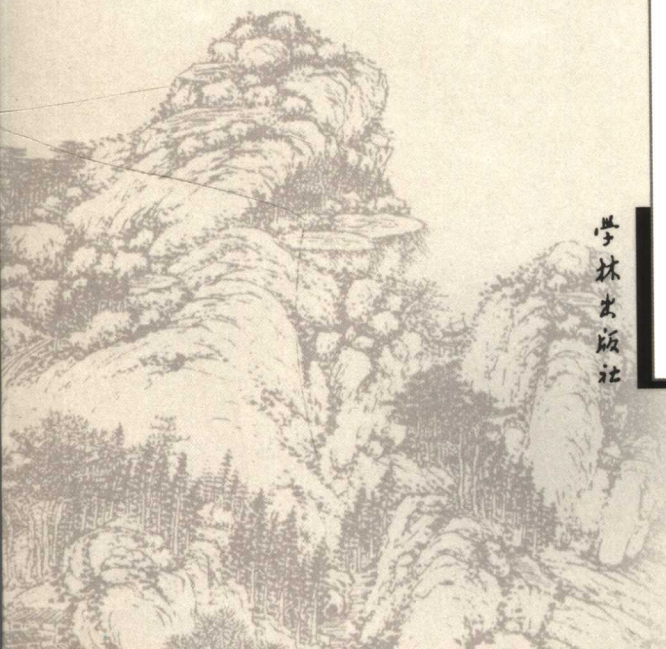


刘方■著

文化视域中的宋代文论

学林出版社



刘方 ■ 著

文化视域中的宋代文论

学林出版社



浙江省 151 人才培养基金项目
浙江省高校中青年学科带头人培养基金项目
浙江省社科规划项目
浙江省社联项目
结题成果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文化视域中的宋代文论 / 刘方著. —上海: 学林出版社, 2006. 6

ISBN 7-80730-177-5

I. 文... II. 刘... III. 文艺理论—研究—中国—宋代 IV. I0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6)第 058100 号

文化视域中的宋代文论



- 作 者——刘 方
责任编辑——曹坚平
封面设计——鲁继德
出 版——上海世纪出版股份有限公司
学林出版社 (上海钦州南路 81 号 3 楼)
电话: 64515005 传真: 64515005
发 行——新华书店上海发行所
学林图书发行部 (上海钦州南路 81 号 1 楼)
电话: 64515012 传真: 64844088
印 刷——上海译文印刷厂
开 本——889 × 1194 1/32
印 张——11.5
字 数——24.3 万
版 次——2006 年 6 月第 1 版
2006 年 6 月第 1 次印刷
印 数——3300 册
书 号——ISBN 7-80730-177-5/I·36
定 价——21.00 元

(如发生印刷、装订质量问题、读者可向工厂调换。)

作者简介

刘方，湖州师范学院中文系教授，文学博士生。浙江省新世纪 151 人才，浙江省高校中青年学科带头人。出版学术专著《宋型文化与宋代美学精神》、《中国禅宗美学思想研究》、《中国美学的基本精神及其现代意义》等 7 部。在《文艺理论研究》等刊物发表论文 60 余篇。



目 录

第一章 20 世纪中国文学批评研究的局限与出路/1

——以宋代文论为例

第一节 中国传统知识型、知识谱系的现代转型/1

中国学术思想保持连续发展的总体特征——以西方知识谱系来整体性切换中国传统知识——体系的建构,本质的追寻,规律的探索,科学性观念下将中国文学理论、批评史建成科学的努力

第二节 取得显著成绩背后的问题:西方“他者”眼光/6

中国古代文论研究在高起点的基础上已经发展的相当成熟——研究大多数仍然是在旧有思路、框架、模式下的延续——在自觉依据西方诗学他者眼光的情况下,不自觉地遮蔽了中国传统文学理论批评的内在理路与知识谱系——宋代有关人格、道德、气节等方面的内容,何以需要提出——中国文学批评基本精神得以凸现出来

第三节 两个突出问题/19

观念历史的研究——士大夫心态难免就成了未必符合历史真实面貌的臆测——“向内收敛的创作心态”——习惯性偏见——追求普遍性规律的研究模式,能否真实地反映出文学批评思想实际——布罗代尔“长时段”理论——福柯的另一种思想历史的写法——讨论中国文学批评问题时,需要重建更为复杂的历史叙事

第四节 学科的合法性问题/38

后来的批评史著作,无论是拓展研究范围,还是扩大篇幅,都未离开开创时期建立起来的基本构架——称为“中国文学批评史”是否与它的研究对象相符合——我们有的是“中国文学批评”,还是“文学批评在中国”——文学批评的普遍主义的质疑——开启被西方文学批评“他者”眼光所忽视、遗忘、遮蔽甚至压抑的中国文学批评的固有思想

第五节 发展方向/47

新观念新方法下的新材料——强调文献资料者,常常是沿袭着原有的研究思路、框架来发掘、整理材料——取得优异学术成就的学者,与新观念的接受和新方法的使用联系在一起——关于“什么是历史”的观念不同了,研究历史的领域也扩大了——文学思想史研究中的观念变化,有可能把很多东西,包括过去不曾使用也不能使用的东西,都变成了自己的资料——把图像作思想史资料——无法回避新历史主义等后现代主义理论、思想与方法的挑战与影响——何伟亚《怀柔远人》的启迪和意义——将理论还原到产生的原初、具体、丰富而感性的文化历史语境中——丹纳的观点与积极影响——托马斯·库恩强调必须学会象亚里士多德那样考虑问题,才能够真正理解亚里士多德所提出的理论——现象学的“构成”洞见——知识社会学的观点——余英时《朱熹的历史世界》成功范例——艾尔曼对清代常州今文经学的研究——一个值得努力的方向

第二章 道的逃逸与承当/75

——唐宋道论文学思想兴盛的文化语境与思想场域

第一节 社会失范与精神危机的重新思考/75

唐宋思想转型——信仰危机的内在原因,决定了此后几百年中国社会与思想历史脉络的走向——将思想史作为哲学史的范畴来研究,脱离了活生生的社会生活——回到历史事件发生的原初境域本身——中唐社会正处于严重的社会失范状态——在社会失范的生存状况下,士大夫所能够依凭的只能是对于“道”的信持——中唐以后精神信仰的深刻危机,从根本上动摇士大夫对于理想人格的追求与坚持

第二节 精神信仰危机的典型心态体现/86

传统文化中公、私的领域缺乏明确划分和制度保障,导致了私人性话语表达的缺乏——文学作品中零星流露,窥见信仰危机的真实图景——士大夫传统理想人格动摇与危机在整个士大夫阶层中广泛地表现出来——精神的深刻危机才是最根本也最致命的——儒学复兴运动的领袖人物白居易和韩愈等人,流露出真实的生命困惑与信仰危机——为后人推尊为“诗圣”的杜甫,同样开始产生精神的绝望与信仰的动摇——对于依靠诗赋而通过科举考试的新贵们的人格的批评,在中唐以后就不绝如缕——儒门淡薄,收拾不住

第三节 道的承担与终极依据的重建/114

传统价值体系的崩溃必然产生严重的后果——在一个信仰普遍危机的时代,过去的一切不言自明的东西,现在都成了问题——重建安身立命的价值关怀与终极依据就成为时代的最为急迫的任务——信仰贫困的时代诗人何为——对于道的承担与逃避,决定了韩愈与白居易在思想历史上不同的地位——“奇里斯玛”气质——韩愈重建士人文化精神的历史地位——困境意识——韩愈道统论是一次力图振兴和重构儒学传统的努力——将传统的以宇宙论为终极依据的思路转型为以重建心性论为终极依据的新思路——哪里有危险,哪里

也就有教——《争臣论》“以道抗势”的精神——文以明道——从韩愈开始，“文”的崇高的地位被牢牢确立起来

第三章 道的重建与文的再思/150

第一节 重建终极依据的内在超越途径与宋代文学思想的文化功能/150

重建终极依据成为宋代士大夫生死攸关的紧迫时代课题——个人的修养或修持成为能否超越的关键所在——儒家是否是宗教这一问题本身展现了一种中西不同文化语境之间的差异性和冲突性——儒家思想有其宗教性源头——儒学具有内在超越性——儒家把修炼和践履当作实现人生终极价值的根本途径和永恒使命——儒学提供了士人的安身立命之所——文学思想往往承担起诗人哲学家的责任和宗教拯救的义务——宋代文学思想中，道的重建与文的重建，文学与道德、人格之间的内在联系是必然和自然的。

第二节 文道思想的多元探索/179

宋代士大夫从多个方面对于道的内涵进行了不懈的探索与重新建构——道与文的关系多方面、多角度的思考，形成宋代文学理论领域的众声喧哗的局面——徐铉在一个新的文与道的关系视野中来关注文学问题，体现了某些新的特征和时代先声——晁迥对对宋学的形成具有重要的意义和作用——智圆沟通儒佛两家思想——柳开力矫文弊，重树古文旗帜，建构道统系谱——石介与孙复二人，上承韩愈，下启理学，为儒学的道统论鼓与呼——王禹偁对于文学自身的价值给予肯定

第三节 文学家的文道观/213

——以欧阳修、苏轼为代表

欧阳修在北宋士风建设过程中的巨大作用——我所谓

文,必与道俱——从欧阳修开始,形成北宋政治、文学与学术三位一体的文化特征——苏轼兄弟为代表的蜀学,不仅在政治立场、学术观点上与当时王安石为代表的新学和二程为代表的洛学有很大差异,而且在文学思想与文学理论上也与他们各流派有比较尖锐不同——作为新学代表与变法领袖,王安石在文学理论上强调文应当贯道、明道

第四节 道学家的文道观/234

——以二程、朱熹为代表

新的学术思潮和学术体系形成了新的道学文化——理学的最重要贡献,就是在儒家文化发生信仰危机的关键时刻,重新确立了具有天道依据的人文信仰——二程的文道观典型地体现了理学家的文道观念——朱熹求道,根本上说,是对生命存在的追问——朱熹的文道观与周、程等人一脉相承,但有所发挥和修正——将文道关系明确地上升到了本体论的角度——文与道不可分——重道而不轻文,重道而不废文——当代对于理学家文道观的激烈批评,是站在西方现代文论观他者立场的结果——文学自律性文论观只是一种地方性知识——世界文学理论在近年的发展,质疑了将文学性、审美性视为文学的根本特性的文论观的理论前提预设与方法论基础

第四章 文学思想转型与新的文论表述话语的建构/259

——以宋代诗话为例

第一节 文化转型与宋代诗话的发生与建构/259

唐宋变革与宋型文化的形成——宋学建构的不仅是一种新的知识体系,更包含着一种对终极存在之道的信仰——中国传统诗学思想与起源于古希腊的西方诗学

思想有着极大的差异性——中国传统诗学话语是表达个人对人生的在世方式及其理想境界的理念——西方诗学的尺度作为标准,来衡量、研究诗话,从而遮蔽了中国诗话的原生视野与性质、文化背景、文化内涵与其特定的理论预设,社会预期与社会功能——诗话在宋代发生的文化语境——宋代文人社会发展的产物——科举繁荣、教育普及形成的读书风气是诗话产生的重要社会土壤——刻书出版业的发达为诗话的勃兴奠定了牢固物质基础——诗话在宋代产生的内在理路与知识、学术支撑——宋代诗话的产生与士大夫笔记的发展与繁荣——诗话与说话、话本——诗话在宋代的产生与宋代史学繁荣——与诗歌有关,具有补史价值,以士大夫交流为基础,以愉悦为目标,才是诗话产生的最初因缘——以历史学家的眼光和方法,以闲适、愉悦为目的,从事领袖诗坛的诗歌创造与交流互动,“以资闲谈”的诗话也就从体制到名称在欧阳修手中诞生了

第二节 宋代诗话的文化意蕴与独特性质

艺术不朽的疑虑与生命长存的渴望/312

——《六一诗话》诗学思想的深层动机与

文化心态初探

生命凋零所唤醒的生命意识的强烈觉醒——欧阳修将诗学提高到了对生命存在、价值、意义的诗性之思——与遗忘抗争:抵御第二次死亡的最后努力——疑惑与无奈:艺术是否可以使人不朽——《六一诗话》本身成为一种对于人生的解蔽、生命意义的敞亮的不懈探索和对于艺术生命的审美的拯救

第三节 “闲话”与“独语”:宋代诗话的两种叙述

话语类型/343

——以《六一诗话》和《沧浪诗话》为例

“闲话”与“独语”构成宋代诗话的两种话语类型——在理想境界上,前者追求还原日常生活,从而具有“在场性”的特质。后者呈现的则是一种理论自足的距离感——在结构上,前者呈现出随笔式,后者则追求体系性——在文体风格上,前者追求幽默风趣而后者则体现出霸权话语特征——在文本特征上,前者呈现出对话中的众声喧哗而后者则体现独语下的异端批判——两种话语类型标志着宋代诗话的两种价值取向和两种诗话观

第一章 20 世纪中国文学批评研究的 局限与出路

——以宋代文论为例

第一节 中国传统知识型、知识谱系的现代转型

中国百年来的现代文化转型引发了学术研究的由传统向现代的转型。20 世纪中国文化的现代转型,与中国古代文化的阶段性发展、转化,有着根本性差异,中国文化的现代转型,乃是福柯的知识谱系学意义上的整体性转换。福柯在《词与物》中开创性地研究和探索了西方文化思想史上的知识型的断裂与转型,^①从实质上看,我以为西方文化思想史上的知识型的断裂与转型恰恰与西方文明发展的破坏性演进方式密切地联系在一起。

中国传统文化历史的发展,在相当长的一个历史时期内,是走着一条与西方文明极不相同的演化道路,形成其自身发展的独特性。中国传统文化的发展,不是以破坏性演进,即人与自然关系的改变、隔离等为特征,而是以连续性演进,即人与自然、地与天、文化与自然的统一连续为特征的^②。

① [法]福柯《词与物——人文科学考古学》,莫伟民译,上海,上海三联书店,2001 年版。

② 参阅[美]张光直《中国青铜时代二集》,北京,三联书店,1990 年版。

与中国文化演进发展的连续性特征相联系,中国学术思想也在整体上保持了一种连续发展的总体特征。虽然中国文化从远古图腾崇拜到“绝地天通”,从先秦诸子到六朝所谓“佛教征服中国”,一直到明清时期龙与上帝之间纠葛下的文化冲突与融合,中国传统文化一次次受到外来文化的影响、渗透与挑战。但是,无论是佛教东渐,还是耶教东进,虽然对中国文化演进、发展产生了或大或小的影响,使中国文化面貌产生了或大或小的改变,但从整体而言,基本知识质态和知识体系的整体性架构却一直延续,以解经为突出特征的传统学术思想最恰当地呈现出这一文化连续性的内在质态。

五四新文化转型则截然不同,“三千年未有之大变局”,无论是知识质态还是知识谱系,都发生了深刻的、根本性的断裂与转换,五四激进地反对传统文化,一切价值重估^①,正是要在彻底清除旧文化基础之上建构起现代形态的新文化。借用卢卡契的“总体性”概念,可以说中国现代知识型的替换,知识谱系的转型真正属于总体性的。

福柯《词与物》中所称的西方始自 19 世纪的现代知识型,构成了 20 世纪中国文化学习、模仿和追求的榜样、理想与准则。由此,知识的性质以及关于知识合法性的信念发生了根本性转换,在以理性与科学为核心观念建构起来的西方现代知识型作为标准、尺度来衡量,中国传统知识,除了清代朴学还算有几分科学性外,其他知识一概成为“前科学形态”。由此,在关于知识合法性的信念转换为科学与理性后,一切可

^① 参阅[美]林毓生《中国意识的危机》(增订本),贵阳,贵州人民出版社,1988年版。

靠性知识便必须具有科学性,一切知识都成为系统科学的不同门类,科学上升为检验一切合法性的尺度、标准。“要求是非、真伪,除去科学还有什么办法?”^①而一旦科学成为真理的代名词,成为绝对可靠的合法性和权威性的依据,则也就宣告了中国传统知识的失效。

1923 年,胡适为《科学与人生观》作序,便提出了一整套以西方知识谱系来整体性切换中国传统知识的轮廓^②,而 20 年代科、玄之争的结果也清楚表明了“科学主义”在当时中国知识分子中占了主导的、流行的地位。正如林毓生指出的,现代中国的“科学主义”,是指一项意识形态的立场,它强词夺理地认为,科学能够知道任何可以认知的事物(包括生命的意义)。科学的本质不在于它研究的主题,而在于它的方法,所以,科学主义者认为,促进科学方法在每一个可能领域的应用,对中国和世界来说是非常必要的,可以说“科学主义”的发展与追求,也即成为 20 世纪中国知识形态的演进的历史方向^③。周策纵在《五四运动:现代中国的思想革命》一书中指出:“五四运动改革者的主要目的是创建一个新中国,其方法之一即以新思想代替旧的和传统的思想”^④,这种“代替”的过程,也即是以西方现代知识型,知识谱系来彻底转换中国传统

① 丁文江《玄学与科学》,《努力周报》第 48 期。

② 胡适《科学与人生观序》,《科学与人生观》,上海,上海亚东图书馆 1923 年版。

③ [美]林毓生《中国传统的创造性转化》,北京,三联书店,1988 年版,第 252 页。

④ [美]周策纵《五四运动:现代中国的思想革命》,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1996 年版,第 400 页。

知识型、知识谱系的过程。在这一过程中,努力建构起具有现代特征的科学知识共同体。^①

将科学知识看成是衡量一切知识与价值的标准的观念起源,在西方也是十分晚近的事情。著名学者华勒斯坦等人所提供的著名研究报告《开放社会科学》中指出:

十九世纪思想史的首要标志就在于知识的学科化和专业化,即创立了以生产新知识、培养知识创造者为宗旨的永久性制度结构。……自然科学……允诺能够创造出直接有用的实际成果,并以此为基础要求得到社会的和政治上的支持。^②

而正是在知识型的置换与知识谱系的变更的过程中:

到十九世纪初,科学终于大获全胜,其独尊地位在语言上得到反映。人们把不带限定性形容词的“科学”一语主要地(而且经常是唯一地)与自然科学等同了起来。迄今为止,自然科学一直都在竭力地为自身争取与另一种称为哲学的知识形式完全相异甚至截然对立的社会思想上的合法性,而上述事

① 有关这一方面的详细而深入的研究,可以进一步参考汪晖《现代中国思想的兴起》,北京,三联书店,2004年版。郭颖颐《中国现代思想中的唯科学主义》,雷颐译,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

② [美]华勒斯坦等著《开放社会科学》,刘锋译,北京,三联书店,1997年版,第8—9页,第7页。

实则标志着自然科学的这种努力达到了顶点。^①

在西方逻各斯中心主义文化背景下,将知识谱系加以细密的学科划分,它在将一切现象视为科学研究对象的前提下把人类知识域先行划分,确认为社会科学、自然科学、人文学科等逻辑理念域,而后在各门学科范围内纯化概念,形成规范,并累进性演化知识。而在现代中国知识转型过程中,西方近代形成的逻辑严密,划分精细的知识谱系也就“总体性”地将中国传统知识谱系,从刘向《七略》到《四库全书》的知识分类系统取而代之,并延伸至今。^② 而中国传统知识谱系中所潜含的理论前提与预设,折射着“思想秩序”,“关于世界的观念与价值的秩序”^③也随之消逝,遮蔽了。而伴随着现代民族国家的建构过程,传统的学术也被改造为现代的“国学”。^④

现代意义上的对于传统中国文学理论、批评的历史研究,也同样是在这一知识背景、社会思潮与文化语境中展开的。因而,西方文学批评历史的现代研究方法、体系、框架、模式,便不仅是一种参照系,更是在相当长的时期,被认为具有世界

① [美]华勒斯坦等著《开放社会科学》,刘锋译,北京,三联书店,1997年版,第8—9页,第7页。

② 参左玉河《从四部之学到七科之学》,上海,上海书店出版社,2004年版。

③ 参阅葛兆光《中国思想史》第一卷,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1998年版,第590页以下。

④ 参罗志田《裂变中的传承——20世纪前期的中国文化与学术》,北京,中华书局,2003年版。罗志田《国家与学术——清季民初关于“国学”的思想论争》,北京,三联书店,2003年版。

普遍性的榜样,共同发展的目标。^①正如朱自清关于中国文学批评史所指出的:

“文学批评”一语不用说是舶来的,现在学术界的趋势,往往以西方观念(如“文学批评”)为范围去选择中国的问题,故无论将来是好是坏,这已经是不可避免的事实。^②

也正因如此,20世纪中国文学理论、批评史体系的建构,本质的追寻,规律的探索,科学性观念下将中国文学理论、批评史建成科学的努力,也便是这种思潮和追求下的自然发展与要求。应当看到,在这种理想追求的推动下,历经几代学者的努力,在以现代学术范型来研究中国传统文学批评理论方面,的确取得了巨大的成绩。

第二节 取得显著成绩背后的问题: 西方“他者”眼光

有关20世纪中国文学批评历史研究的全面总结与评论,已经有罗宗强、邓国光《近百年中国古代文论之研究》^③,彭玉

① 参阅刘方《百年美学:现代与中国传统》,《西南民族学院学报》,2000年第2期。

② 《中国美学研究范型与方法的省思》,《文学前沿》No. 5,北京,首都师范大学出版社,2002年版。

③ 朱自清《朱自清古典文学论文集》下册,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1年版,第539页。

④ 罗宗强、邓国光《近百年中国古代文论之研究》,《文学评论》,1997年第2期。